

#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sup>1</sup>

( 1921 年 3 月 )

## 开 幕 词

( 3 月 8 日 )

(长时间鼓掌) 同志们，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我们又度过了一年，这一年中，无论在国际或国内，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如果从国际局势谈起，那么应当指出，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正的基础。那些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sup>2</sup>上还不过是决议的东西，一年来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中已经付诸实现，得到了体现、证实和确认。只举出这三个国家，你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国际在去年夏天莫斯科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成为欧洲各先进大国工人运动的事业，不仅如此，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因素。同志们，这是一个巨

大的胜利，尽管我们还要经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 这是我们决不能够也决不当忽略的—— 但是，这个胜利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

其次，同志们，我们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的：全世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所支持的敌军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上已经不存在了。由于红军这一年来的胜利，我们才能够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召开党代表大会。三年半的斗争是极端艰苦的，但是敌军在我们的领土上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我们争取到了！当然，我们还远远没有因此而争取到一切，还绝对没有争取到我们应当争取到的东西—— 真正摆脱帝国主义者侵犯和干涉。相反，他们对我们采取的战争行动在形式上虽然较少带有军事性质，但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来说却更严重更危险。在上次党代表大会<sup>3</sup>时，我们就在迎接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并且设法实现这一转变，设法安排好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直到现在，我们党还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涉及经济计划（在这方面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不仅涉及经济建设的原则，而且涉及我们社会中、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中现有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的原则。阶级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问题是这次会上大家应当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个看法。

同志们，我们度过了极不平常的一年，我们竟干出了搞党内辩论和争论这种奢侈行为<sup>4</sup>。党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联合起来的十分强大的敌人的包围之中，又肩负着空前的重担，对于这样的党来说，这种奢侈行为实在令人吃惊！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现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你们是否认为

种奢侈行为同我们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完全相称呢？这要由你们来判断。但是有一点我无论如何必须指出：我们在这次大会上必须提出一点作为我们的口号，作为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实现的主要目标和任务，这就是我们在经过辩论和争论之后，必须比开始辩论和争论的时候更加坚强。（鼓掌）同志们，你们不会不知道，我们所有的敌人（他们多得数不胜数）在他们那些数不清的外国报刊上，一再重复并扩散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在苏维埃共和国里散布的流言蜚语，他们说：有辩论就有争执，有争执就有纠纷，有纠纷共产党人就会削弱，所以要抓住时机，趁他们削弱的时候压他们一下！这已经成了我们敌人的口号。对此我们一刻也不应当忘记。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表明，不管我们过去容许这种奢侈行为对不对，现在我们都必须摆脱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党代表大会上，对大家提出来辩论过的数量极多的纲领和各种各样的细微的、极细微的、微乎其微的分歧意见都认真地审查一遍，然后对自己说：不管我们过去辩论得怎样激烈，不管我们曾经争论得怎样面红耳赤，现在我们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在农民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任务又是这么繁重而艰巨，如果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大家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就证明是这样的——那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而且再也不能有一点派别活动了，不管过去派别活动表现在哪里，表现得怎么样，也要使派别活动完全绝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我相信，如果我说，我们通过这次大会至少要使党更加巩固、更加一致、更加精诚团结，这一定表达了你们大家的愿望和坚定的决心！（鼓掌）

## 2

## 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

( 3 月 8 日 )

同志们，大家当然都知道，中央的政治工作问题是同党的全部工作，同苏维埃机关的全部工作以及革命的整个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至少我认为是这样——就工作报告这个词字面上的确切含义来讲，工作报告是作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尽量挑出一些特别重要的事件来谈，这些事件在我看来是这一年来我们工作中和苏维埃政治中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所经历的最突出的事件，这些事件能够提出很多的材料，供我们考虑革命进展的原因，所犯错误的意义（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以及对将来的教训。这是因为，尽管报告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是中央必须做的，而且这件事本身是党所关心的，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日益展开的斗争任务是那样紧急，那样艰巨，那样困难，那样沉重地压在我们身上，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密切注意怎样从过去的经历中得出应有的结论，怎样更好地完成我们所关注的当前的和即将面临的任务。

这一年来，在我们的工作的各种关键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并且在我看来我们的大部分错误与之有关的，首先是从战争向和平转变的问题。你们大家一定都记得，至少多数人还记得，三年半以来，我们已经转了好几次，但是一次也没有转成，而且看来现在也

还是转不成，因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切身利益决不会让这个转变获得成功。记得还在1918年4月，即三年前，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上曾谈到过我们当时的任务<sup>①</sup>，这些任务的提出是以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作为依据的，但实际上那时国内战争还只是刚刚开始。你们都还记得，在上次党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一切打算都是以向和平建设转变为基础的，我们估计当时对波兰作出的巨大让步<sup>5</sup>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但是波兰资产阶级在4月里就发动进攻，他们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把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现，结果他们吃了大亏，接受了一个对他们比较不利的和约。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够转到和平建设，我们不得不重新集中精力同波兰作战，之后又集中精力消灭弗兰格尔。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报告年度中的工作内容。我们的整个工作又转到军事任务上面去了。

后来，我们终于完全肃清了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敌军，开始从战争向和平转变。

这个转变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是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无疑这就是我们在所要报告的这一时期中政策上发生许多错误和过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正在为这些错误和过失而吃苦头。我们的军队是在一个已经精疲力竭的国家中创建的，是在经过了几十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创建的，现在这支军队要复员，可是运输工具缺乏，运送军队异常困难，加之歉收带来了饥饿，燃料缺乏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运输中断，于是，象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这次复员使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对这些难题我们原先是估计得非常不

<sup>①</sup>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23—256页。——编者注

足的。许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还在去年年底，我就已经指出：来年春天的主要困难之一，将是军队复员引起的困难。在 12 月 30 日的大辩论<sup>①</sup>中，我也指出过这一点，这次辩论大概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参加了的。我应当指出，当时我们对这些困难的严重程度还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既没有看出复员在技术上会有多么大的困难，也没有看出先后被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在复员时会加剧到什么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复员才使这些灾难更加暴露出来。几年来，国家对战争全力以赴，把一切用于战争，不惜拿出最后的一点物资，最后的一点有限的储备和资源。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看出国家已经破坏和贫困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这种状况使我们不得不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专门来医治创伤。即使是医治创伤，我们也还不能全力以赴。军队复员的技术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经济破坏的深重，这种严重的破坏除了造成其他困难之外，还引起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战争使我们，使我们整个国家，使千千万万人只习惯于完成军事任务。而军事任务完成之后，军队的大部分人遇到了极其恶劣的情况，在农村中遇到了难于置信的困难，这一危机和总的危机使他们得不到劳动的机会，结果出现了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局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和平仍然无从谈起。正是军队的复员、国内战争的结束表明，我们还无法集中力量进行和平建设，因为复员使战争在继续进行，只是改换了形式。几万、几十万士兵早已只习惯于打仗，把打仗几乎当成了唯一的职业，现在

<sup>①</sup>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213 页。——编者注

复员回到家乡,他们一贫如洗,生活艰难,自己的劳动用不上,结果我们被卷进了一场新形式的战争,新类型的战争。这种形式的战争简言之就是盗匪活动。

毫无疑问,中央的错误是没有估计到复员会引起这么大的困难。当然,应当说明,要进行这样的估计,当时不可能有什么依据,因为国内战争是这样艰苦,唯一的准则是一切为了国内战争前线的胜利——只有这一条。正是由于遵守了这一准则,并且由于红军在反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等等的斗争中竭尽了全部力量,我们才能战胜入侵苏维埃俄国的帝国主义者。

谈了这种造成许多错误、使危机加剧的基本情况以后,我想谈一谈在党的工作中和整个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估计和计划方面存在着许多更为严重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现象和失误——不仅计划方面有失误,而且在确定我们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方面也有失误,而我们这个阶级是必须通过同这些阶级的合作,有时也要通过同它们的斗争来决定共和国的命运。根据这一点,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工作,谈谈政治经验,谈谈作为政治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应当弄清楚并且应当努力向全党说清楚的事情。这里指的就是我们对波战争的情况以及粮食和燃料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进攻时推进得太快了,几乎打进华沙,这无疑是犯了错误。我现在不来分析这是战略错误还是政治错误,因为这样做就离题太远了,我想这是将来的历史学家的事情,现在人们必须继续艰苦斗争,抗击一切敌人,还顾不上研究历史。但是错误毕竟犯了,犯这个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这种力量的优势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经济状况,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爱国主义感情(对波战争甚至激起了那些完全非无产阶

级的、丝毫不同情共产主义的、不是无条件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时应当说是根本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感情），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就太复杂了。但事实是：在对波战争中，我们犯了一定的错误。

拿粮食方面的工作来看，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错误。在报告年度中，余粮收集制的执行情况比上一年好得多。本年度收集的粮食已经超过 25 000 万普特。据统计，到 2 月 1 日止，已经收集到 23 500 万普特，而上一年度全年才收集了 21 000 万普特，就是说，本年度花少得多的时间收集到的粮食，已经超过了上一年度全年收集的粮食。然而，在到 2 月 1 日为止收集来的 23 500 万普特粮食中，上半年就消耗了近 15 500 万普特，就是说，平均每月消耗 2 500 万普特甚至更多一些。毫无疑问，总的说来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粮食情况比上一年好的时候，没有能够合理地进行分配。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地估计到开春时出现的危机的全部严重性，而是很自然地一心想增加挨饿的工人的配给额。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我们没有进行计算的依据。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尽管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存在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混乱状态，它们在制订经济计划时，却有几十年的经验可作依据，各个经济制度相同、只是具体情况有些差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参考这种经验。从这种参考中可以得出真正科学的规律，得出一定的规律性和常规。但是这种可供计算参考的经验我们一点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因此很自然，当战争结束后我们终于能够给挨饿的居民多分配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一下子还掌握不好分寸。显然，当时我们应当控制配给额的增加，节省出一定数量的后备粮来应付今春的困难的日子。现在，困难的日子果然到来了。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结果



又犯了我們整个工作中常犯的错误。这种错误说明，由于从战争向和平转变，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很多，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准备，缺乏必要的资料，结果就使危机大大加重、加剧和恶化起来。

燃料方面显然也有类似的情况。燃料是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从战争向和平转变，向经济建设转变，即上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的、并且是报告年度内整个政策所最关心和注意的事情，自然不能不以对燃料产量的估计以及燃料的合理分配作为基础。否则，不论克服困难也好，恢复工业也好，都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我们的情况比上一年好，这是很明显的。过去我们同产煤区和产油区断了联系。红军节节胜利，我们得到了煤和石油。燃料毕竟是增加了。我们知道，在报告年度内，我们的燃料比过去多了。但是在燃料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又犯了错误，一下子把燃料大量分配出去，把燃料用光了，以致在一切工作纳入正轨之前，我们就遇到了燃料危机。关于所有这些问题，你们会在这里听到专门的报告至于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材料，我现在不可能向你们提供，甚至讲讲大概的情况也不可能。但是不管怎样，考虑到过去的经验，我们应当指出，这个错误是同我们对情况的错误估计以及从战争向和平转变得太快有关的。事实上，这个转变实现起来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得多。准备时间要长得多，速度要慢得多——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年中得来的教训，全党应当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以便确定我们明年的基本任务，并且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

同时应当指出，歉收无疑使这些错误、特别是由这些错误造成的危机更加严重了。虽然我说过，在报告年度内，粮食工作使我们的粮食大大增加，但是必须说明，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正是在这

里。由于歉收,饲料极为缺乏,牲畜死亡,农民经济破产,因此,征粮便集中在余粮不多的地区。共和国的各个边疆地区,如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地,余粮要多得多,然而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机关极不完善,苏维埃政权不太巩固,运输也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只得在收成最差的省份多收集一些粮食,结果就使农民经济的危机特别严重起来。

这里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我们缺乏应有的正确估计。但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处境非常窘迫,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一个国家遭受了带来严重破坏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碰到连年国内战争,当然只有把一切力量都用于前线,否则便不能生存。象我们这样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只能向农民收集余粮,甚至不给他们任何其他产品作补偿。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军队,拯救工农政权,当时必须这样做。我们对农民说:“当然,你们是在贷粮给工农国家,但是不这样做,你们就不能把自己的国家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拯救出来。”当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我们毫无选择的余地。而这些情况就使得我国的农民经济在连年战争之后凋蔽不堪;由于播种面积缩减、生产资料损毁、单位面积产量减少、劳动力缺乏等等,必然出现歉收。歉收的情况非常严重,因此,虽然收集余粮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危机加剧,它可能使我们在最近几个月内遇到更大的困难和灾难。我们在分析报告年度的政治经验和考虑新的一年应当提出什么政治任务的时候,必须认真估计到这些情况。报告年度留给下一年的,依然是这样一些亟待解决的任务。

现在我要谈谈另一个问题,完全属于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占去了党许多时间的关于工会的辩论。这个问题今天我已经提到

过了，当然，我只能谨慎地说，你们中间很多人恐怕都认为进行这场辩论是一种过分的奢侈行为<sup>①</sup>。至于我个人，还不能不添上一句：在我看来，这种奢侈行为确实是完全不能容许的；我们进行这场辩论，无疑是犯了错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把根据客观条件不应占首要地位的问题，放到了首要地位；我们搞起这种奢侈行为，却没有认识到，我们因此而大大转移了对紧要的、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的注意力。这场辩论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并且几乎使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感到厌烦了，但是实际结果怎样呢？关于这个问题，你们会听到专门的报告，不过我想在我的工作报告中请你们注意一点，就是这里无疑也用得上“因祸得福”这句谚语。

可惜祸显得多了一点，福少了一点。（笑声）但是，福还是有的：我们虽然损失了时间，虽然使党内同志转移了对同包围我们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这一迫切任务的注意力，但是却学会了认识某些我们过去从未发现的相互关系。福就在于党在这场斗争中不能不学到一点东西。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但是，党在这场辩论中得到了某种必须记取的教训。有些纲领，主要得到党的一些“上层”的拥护。这些纲领有时叫作“‘工人反对派’<sup>②</sup>的纲领”；有时又有别的叫法，事实上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工团主义倾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而是在座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喊声：“对！”）

党在这场辩论中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的，它看到“上层”有些

<sup>①</sup> 见本卷第2—3页。——编者注

动摇,听到‘上层’说‘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请你们来评断一下吧’,它就很快地动员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绝大多数最有影响的党组织都很快地向我们反映说:“我们有意见,我们要把这些意见告诉你们”。

在这场辩论中,我们收到了大批纲领。纲领实在太多了,拿我来说吧,因为职务关系,应当读一读,但是,我怕我已经犯了错误,因为我没有把它们读完。(笑声)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是否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来读它们,但是至少应当指出,已经暴露出来的这种工团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提供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材料。几个月来,我们太奢侈了,竟醉心于研究各种细微的分歧意见。而在这时候,军队的复员引起了盗匪活动,加剧了经济危机。这场辩论应当帮助我们懂得:我们这个约有 50 万党员甚至超过 50 万党员的党,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这是一,第二,它又是一个执政党;而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党,党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就多少会反映到党内来。懂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一点工团主义的或者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不可怕,因为党很快就会觉察到并且会坚决加以纠正。但是,如果这种倾向是由农民在国内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况造成的,如果这些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不满,农民经济的危机极端严重,农民军队的复员抛出了千千万万疲惫不堪的士兵,使这些只习惯于打仗、以打仗为职业的人无事可做,从而引起盗匪活动,那么,在这种时候就不应该争论理论倾向问题了。我们应当在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容许再争论倾向问题了,我们必须结束这方面的争论。党代表大会是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的,党代表大会应当从这件事

中吸取应有的教训，把它补充到中央的政治工作报告里去，把它确定下来，肯定下来，变成党必须遵守的义务，变成法律。争论的局面变得极其危险，简直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威胁。

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对一些在辩论中同我接触过、争论过的同志说：“小心，这种局面威胁到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工人阶级的专政！”他们却说：“这是恐吓手段，您是在吓唬我们。”<sup>①</sup>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对我的意见扣帽子，说我吓唬人。我总是回答他们说，如果我想来吓唬受过种种考验的老革命家，那就太可笑了<sup>①</sup>。你们只要看看复员困难到了什么程度，那就会相信，这不但不是什么恐吓，甚至也不是争论中所免不了的意气用事，而是十分正确地指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指出了我们需要团结、沉着和纪律；这不但不是因为不这样无产阶级的政党便不能齐心协力地工作，而且是因为春季已经产生并且还要产生很多困难，如果没有高度的团结，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行动。我认为我们毕竟可以从辩论中得出这样两个主要的教训。因此，我觉得必须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太奢侈了，致使全世界都觉得奇怪：一个党在殊死斗争的最困难情况下，而且在发生歉收和危机的条件下，在遭到经济破坏和军队复员的条件下，竟然用尽心思去研究各种纲领的细枝末节，那么现在我们应当从这些教训中得出一个政治结论，应当不仅得出关于各种错误的结论，而且得出关于阶级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政治结论。这种关系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这种关系要求无产阶级大大加强团结和集中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危险性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之流合在一起还要大

<sup>①</sup>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55—256页。——编者注

许多倍。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造成的困难是很大的，克服这种困难，需要紧密的团结——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团结——需要齐心协力的工作，需要统一的意志；因为只有当无产阶级群众具有这样的意志时，无产阶级才能在一个农民国家中实现自己艰巨的专政任务和领导任务。

西欧各国的援助正在到来，但是来得不那么快。它正在到来，正在不断增加。

我在上午的会议上已经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我们所要报告的时期内最重大的因素之一<sup>①</sup>，这件事也是同中央的工作有密切关系的。毫无疑问，今天的国际革命比去年前进了一大步。毫无疑问，在去年代表大会召开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只是表现在发表一些宣言，而今天它的存在已经表现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了独立的政党，并且不仅如此，还是先进的政党，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国际不但成了工人运动的中心，而且成了这些国家整个政治生活令人注意的中心。去年秋天，只要一拿起德国或法国的报纸，就会看到上面满篇都在谈论莫斯科和布尔什维克，就会看到他们给我们加了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把布尔什维克和加入第三国际的 21 项条件<sup>8</sup>变成了本国整个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这是我们的胜利，这是任何人也夺不走的！这表明国际革命在发展，同时欧洲的经济危机在加剧。但是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据此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我相信在这个

<sup>①</sup> 见本卷第 1 页。——编者注

大厅里不会有这样的人。三年来，我们已经逐渐懂得：寄希望于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现在发展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到春天可能会引起革命，但也可能不引起。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工作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能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消除（哪怕是逐渐消除）我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危机。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是正确的，清醒的。

现在我谈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中央本年的工作有关，并且同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对外关系问题。

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曾经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力争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为此，我们采取了各种外交步骤，并且也确实战胜了那些大外交家。例如，美国的或是国际联盟<sup>9</sup>的代表，曾经向我们提出一些条件，要求我们停止对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军事行动，他们以为这样就会使我们陷于困境。但实际上，陷于困境的是他们自己，而我们却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结果，他们出了丑，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条件，后来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文献和报纸都揭露了这件事。但仅仅是外交上的胜利，对我们来说是太不够了。我们需要真正的贸易关系，而不只是外交上的胜利。贸易关系只是这一年来才有了一些发展。同英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从去年夏天起，这个问题成了中心问题。可是对波战争使我们根本顾不上这个问题了。英国本来已经打算签订贸易协定。英国资产阶级希望签订这种协定，但是英国的宫廷人士不愿意，并且从中作梗，而对波战争又拖延了协定的签订。结果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

今天报纸上好象有消息说，克拉辛在伦敦向报界透露，他期待

很快签订通商条约<sup>10</sup>。我不知道这个希望是否完全有把握能够实现。我不敢说究竟如何，但是我应当指出，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视的，并且认为我们作些让步以求得同英国达成贸易协定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会从英国比从别的国家得到更多的东西，英国在这方面并不象德国和美国那样先进。英国是个殖民国家，亚洲政局对它的利害关系极大，苏维埃政权在一些离英国殖民地不远的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有时也使英国极为敏感。这就决定了我们同英国的关系特别不可靠。这种状况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客观原因造成的，苏维埃外交家的任何外交艺术也无济于事。但是同英国的通商条约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同美国签订条约的可能性正在出现，而美国的生产潜力要大得多。

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租让问题。一年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比以前注意多了。11月23日人民委员会公布了一项法令，用外国资本家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阐明了租让问题。当时党内有人对这个问题产生过一些误解，或者说，是对它不完全理解，因此我们召开了几次负责工作人员的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总的说来，它没有引起什么意见分歧，尽管我们听到工人和农民有不少抗议。他们说：“才赶走了本国的资本家，现在却想把外国的资本家请进来。”这种抗议究竟有多少是不自觉的，有多少是反映了非党人士中的富农以至资本家的想法——他们认为，他们才有合法权利在俄国当资本家，并且当掌握政权的资本家，而不应当招来这些不掌握政权的外国资本——这两种情况分别起着多大作用，中央固然没有任何相应的统计材料，世界上的任何统计也未必能把这些情况统计清楚。但是，我们公布这项法令，毕竟在建立租让关系上是前进了一步。应当指出，我们在实践上——这一点决不能忘记——连一个租让



项目也还没有搞成。我们还在争论是否应当尽力设法实行租让。但是，能不能实行租让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争论和决定，而取决于国际资本。今年 2 月 1 日，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一项关于租让问题的决定<sup>11</sup>。其中第一条规定：“原则上赞同在格罗兹尼和巴库以及其他正在开采的油田提供石油租让，并开始谈判，谈判要加速进行。”

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一些争论。有些同志认为把格罗兹尼和巴库的一部分油田租让出去是错误的，会引起工人的反对。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我个人却认为这种抱怨也许是不必要的。

大多数中央委员和我个人都认为这种租让是必要的，希望你们以自己的威信来支持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同其他先进国家的国家托拉斯实行这种联合，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国的经济危机十分深重，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援助，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只输入装备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用更广泛的方式把企业租给最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租出四分之一巴库，四分之一格罗兹尼，以及四分之一我们最好的森林资源，这样来保证我们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建立起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因此得到其余部分所需要的装备。这样，我们就多少（即使是四分之一或一半也好）可以赶上其他国家的现代的、先进的辛迪加。否则我们将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不竭尽一切力量就赶不上他们，任何人只要稍微清醒地观察一下现状，都不会怀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同一些最大的世界托拉斯开始谈判。当然，他们这样做不单纯是为我们效劳，而完全是为了大捞一把。现代资本主义，用一些主张和平的外交家的话来说，就是强盗，就是强盗式的托拉斯，它已经不是从前正常时代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现在靠